

质疑世界遗产“良渚古城遗址”认识的 十大学术泡沫

裴安平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报为“世界遗产”，这的确值得庆贺。一方面它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突出贡献，所以能成为“世界遗产”的项目和数量都名列前茅；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内文化遗产产品品质的提升，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与深入。

然而，“良渚古城遗址”的申报与认识也暴露了许多学术追求与认识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今天国外“先进”理论横行天下，国内学术趋之若鹜，随意拔高考古发现意义，严重缺失学术批评的时代，绚丽多彩的考古新发现不仅掩盖了大量不实的学术泡沫，还使难以洁身自好的“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了“领跑”这个时代的代表和典范。

根据已有的资料与专家论述，“良渚古城遗址”的认识至少有十大学术泡沫。之所以称其为“泡沫”，因为它想超越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的都邑性遗址，故而不仅缺少严谨求实的论证，还毫无根据地随意夸大考古发现的属性和意义，已完全不属于一般的学术问题和不同的学术观点。

泡沫一：“良渚古城”的命名有违学术规范

经过多年的努力调查与发掘，一座良渚文化的古城终于在浙江余杭瓶窑镇的地域范围内被发现了。由于面积巨大，300万平方米，为中国史前土城之最；又由于城内中心部位还有莫家山约30万平方米的人工土台，以及周边所发现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大型祭坛与出土大量玉器的高等级墓葬；所以城址的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更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与国家起源进程的光辉灿烂。为此，专家们就将古城直接命名为“良渚古城”，并藉此突出它的地位与重要性。

不过，在2008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召开的“良渚古城考古规划研讨会”¹上，作者就此提出了不同意见，直言“良渚古城”的命名值得商榷。

第一，违背了以往考古以当地地名命名重大考古发现的惯例，不仅有史以来第一次破坏了考古学的传统，还使人很容易就以为城址的发现之地是在“良渚”而非相距约8公里的“瓶窑”。

第二，“良渚古城”一词与“良渚文化”、“良渚古国”在概念上有重合之处，很容易使人误以为该城是“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的都城，不是良渚文化某一个局部地区的城。

第三，如果今后在良渚文化的范围内又发现一个规模与现在的持平，甚至更大的城，那又该如何命名呢？是否还可以命名为“良渚古城”呢？

实际上，按规范与惯例实事求是地将古城称为“瓶窑古城”并不妨碍对它的历史地位与重要性的认识，而有意违反规范与惯例将其拔高称为“良渚古城”却显示了一种有意拔高其历史地位与重要性的人为情结。尤其是在专家视良渚镇范围为当时城外“郊区”²或“野”地的时候³，“良渚古城”的命名以如此卑微之地为故乡，一方面自我矛盾自我贬损，另一方面也与历史事实和地位不符。

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考古规划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浙江文物网2008年3月27日；金毅：《国内权威专家：良渚古城的年代不用怀疑》，《钱江晚报》2008年3月23日。

² 刘斌等：《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2019年7月8日。

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城内考古发掘及城外勘探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年12月16日8版。

泡沫二：“良渚古城”内根本没有“宫城”

专家认为：古城内的莫角山宫殿区堪称中国最早的宫城，宫殿区的面积要远远超过年代更晚的龙山时代的石峁、陶寺和夏代的二里头宫殿区或宫城，堪称中国最早的宫城，更形象的说，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⁴。

然而，莫角山只是城址的“中心”，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宫城”。

第一，血缘社会没有“宫城”。

中国的历史文献与考古皆证明，“城”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最早的城是属于一定的血缘组织的，后来才逐渐地缘化，才出现“宫城”。中国最早的“宫城”只见于战国时期，并拥有二个最重要的时代特征⁵。一是“宫城”已不再与任何核心血缘组织有关，而纯粹属于不以血缘和民族为纽带的统治阶级；二是，由于正式成为了新型统治阶级的统治中心，所以主要除了宫殿、宗庙以外，也不见有关核心血缘组织族人日常居住的住宅、墓葬和从事日常手工业的作坊。

一般而言，良渚文化所处时代还是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即使是内城的核心区域莫角山也像史前湖北天门石家河⁶、山东日照尧王城⁷、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⁸、明末女真族努尔哈赤所建“赫图阿拉”的内城⁹一样，都是大型血缘组织内部核心血缘组织与族体的驻地。因此，莫角山不可能超越历史出现真正地缘化并属于统治阶级的“宫城”。

第二，莫角山上并没有发现单独的“宫城”。

莫角山曾进行过二次大的考古发掘。

1992—1993年，第一次，发掘面积1400平方，发现了柱洞、取土坑、普通平民墓、土埂与土坯砖堆放场（图1,3）等¹⁰。其中，在小莫角山东南编号为II1T1的10×10米的探方内一共发现32个柱洞¹¹。但是，这些柱洞都“大小、形状各异”，排列也不规矩；而且所有的柱洞竟然皆无石头或烧土类的柱础，也不见江浙一带常见的木质垫板（图1,1）。显然，如此不规范，不整齐，且简陋有余的柱洞，与大型宫殿完全不相匹配，说明莫角山夯土基址之上的建筑遗迹并不一定都是宫殿。此外，在莫角山东南T7清理的一座小墓，仅随葬鼎、豆、壶三件普通陶器（图1,3）¹²，显示地位很低，还有一般的平民。

2011—2016年，通过大规模勘探、长探沟发掘配合探方全面揭露等方法，在大莫角山周围发现宽约4—15、深约0.6—1.5米的围沟。围沟在良渚文化晚期被废弃填平，随后又修建了石头墙基。在大莫角山顶上还发现了7个面积约300至900平方米的房屋台基。在大莫角山西面，发掘也确认小莫角山山顶存在4个房屋台基。早期阶段房基一处，总面积约380平方米¹³。

显然，历年的发掘表明莫角山上确有可能属于宫殿的基址，但它却同时还像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小屯大灰沟以内既有宫殿宗庙又有普通手工作坊一样¹⁴，也与其它普通住宅、手工作坊和墓葬共存，而不存在主要以宫殿为主的“宫城”。

作为考古工作者切忌为了拔高考古发现的意义而偏心，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完整系统地理解自己所发现的古人遗迹，不能有意抬高一部分的意义与价值，而对另一部分视而不见。

⁴ 刘斌等：《良渚古城在中国城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杭州日报》2018年4月26日，第23版。

⁵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682页。

⁶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二五”期间重要考古收获》，江汉考古编辑部2006年版，第31页。

⁷ 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0期，第12—21页。

⁸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04—412页。

⁹ 梁振品：《赫图阿拉城“尊号台”遗址建筑格局及相关问题讨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

¹⁰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69—373页。

¹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莫角山遗址1992~1993年的发掘》，《文物》2001年第12期。

¹²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莫角山遗址1992~1993年的发掘》，《文物》2001年第12期。

¹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城内考古发掘及城外勘探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年12月16日，第8版。

¹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4—2005年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的勘探和发掘》，《考古学报》2009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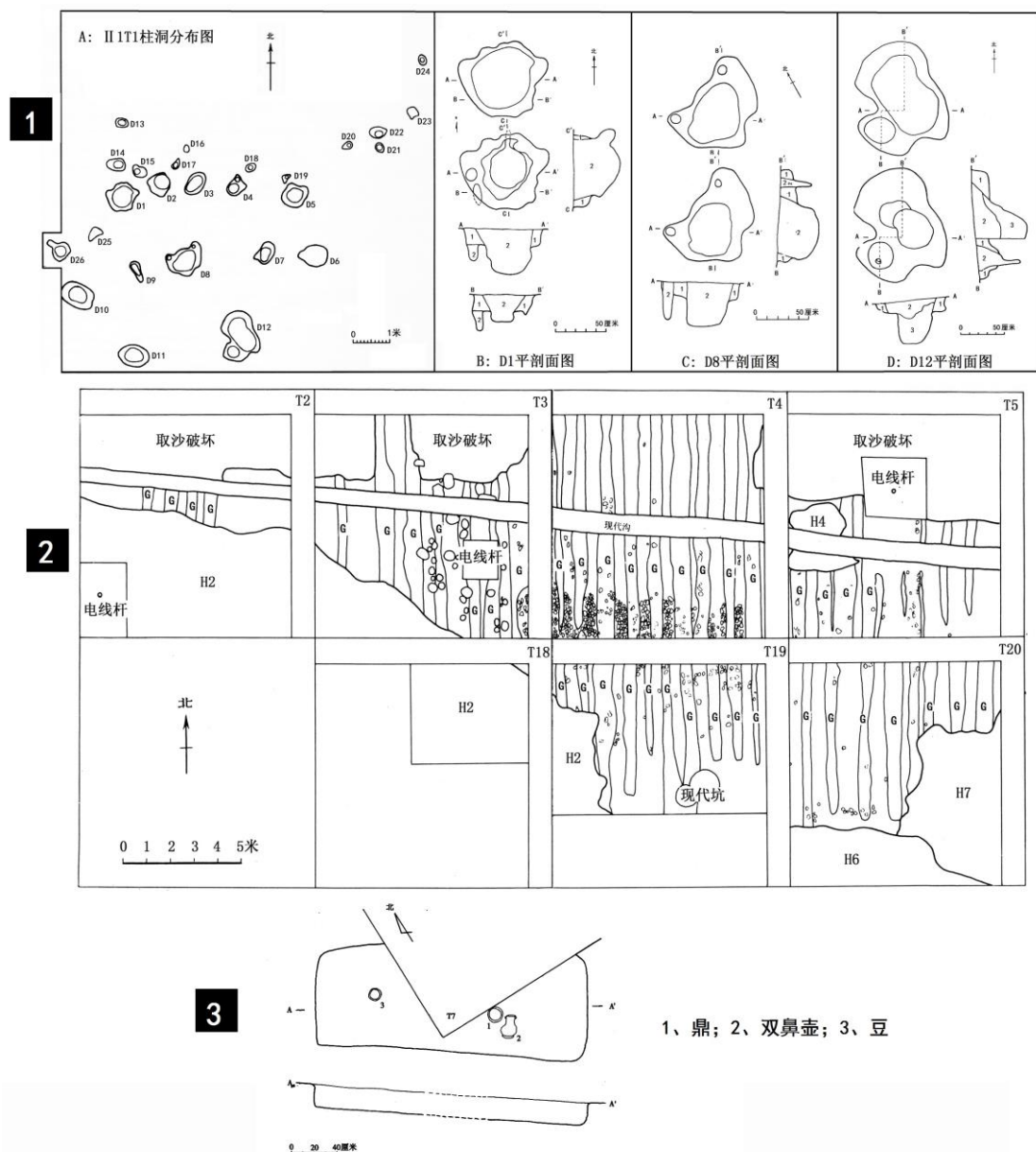


图 1：莫角山 1993 年以前发掘出土遗迹平剖面图

1、II 1T1 柱洞、柱坑平剖面图；2、IV1 区沟埂遗迹平面图；3、莫角山东南小墓平剖面图
(1、2 引自《文物》2001 年第 12 期；3 引自《良渚遗址群》)

泡沫三、四：“良渚古城”内根本没有独立的“王陵”与贵族墓地

专家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之所以规模不亚于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的都邑性遗址，还因为其中包括王陵与贵族墓地¹⁵。

然而，按等级地位将王或个人贵族单独聚在一起并集中葬在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墓地里完全是地缘阶级社会才普遍具有的现象，而史前血缘社会无论地位高低所有的人死了都与族人和家人葬在一起，因而只有氏族公共墓地与家族墓地二种基本的组织类型。“良渚古城”所处的时代充其量也只是血缘与地缘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城里或城外也根本不可能超越时代有单独的“王陵”与“贵族墓地”。

¹⁵ 刘斌等：《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2019 年 7 月 8 日。

（一）“良渚古城”不存在单独的“王陵”

作为一种埋葬制度，考古表明“王陵”有三个基本特点。其一，所有的墓主都是同等地位的王；其二，由于所有的人都是王，因而同一个墓地里的所有人都享受同等待遇，没有明显的地位级差；其三，墓穴之上有如小山一样的封土堆，即“陵”。其中，前二个特点最早发端于商代晚期，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岗所见大墓区就是代表。那里不仅是地位相等的商王单独集中埋葬之地，而且都拥有“亞”字形的四个墓道的大墓和众多的殉人。真正三个特点都齐全的时代是春秋战国，如浙江绍兴印山大墓春秋越王允常墓¹⁶、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¹⁷。

相对而言，被专家誉为“良渚古城”“王陵”的反山墓地，不仅时代太早没有出现小山一样的“陵”，而且已有的发现还表明那里人的地位等级也明显高低不平¹⁸。

其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还有琮王的只有一座墓，即 M12；而在南北两排的 9 座墓中，有 4 墓琮璧钺共存（M14、12、16、20），有 1 墓琮钺共存（M17），有 1 墓琮璧共存（M23），有 3 墓或只有琮（M18）或只有璧（M22、15）。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M15、18 二墓，不仅玉器的种类残缺不全，而且随葬的数量也特少，分别只有 54、61 件，为所有墓随葬玉器数量倒数第一、第二名，即使与倒数第三名 M22 相比，也比它 175 件少了近 2/3。

这不仅说明反山墓葬的等级差异明显，而且说明 M15、18 既不是“王”也不是大贵族；更重要的是由此还证明莫角山根本不是由“王”构成的单纯的“王陵”。

（二）“良渚古城”不存在单独的“贵族墓地”

所谓“贵族墓地”，一般而言就是除了王以外其它有权有势的高等级的人物单独按等级地位集中埋葬之处。

考古表明，这种只按地位而无血缘或民族界限的人都可以集中埋在一起的墓地也完全是社会地缘化的产物，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产物。对此，河南安阳殷墟后岗墓地的整体组织结构就是证明。

后岗墓地可分为六个墓组（图 2），第 I 组就是整个墓地规模最大的墓组，有 18 墓。其中，有三座带二个墓道的“中”字形大墓，一座是带一个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这些墓，毫无疑问都是大贵族，尤其是那些“中”字形大墓，发现的数量很少，墓主很可能就属于王室成员。然而，就在他们的墓穴周围却簇拥着一批地位低下的小墓。其中，I 组就没有墓道的中小型墓 12 座，数量是带墓道墓的 4 倍；II 组一墓带墓道，另有 6 墓不带；三组也是一墓带墓道，另有 13 墓不带。与 I、II、III 组不同的是，IV、V、VI 组不仅都位于 I、II、III 组的外围，也没有一座带墓道的墓，而且 1971 年发掘的第四群墓葬还绝大多数墓室面积不足 3 平方米，随葬品稀少¹⁹。

显然，殷墟后岗墓地虽然有“中”字形大墓 5 座，但它仍然不是一个“贵族墓地”，而是“有王室成员及其家族的墓地”²⁰。与此同时，还说明即使当时的国体是地缘化的，但社会基层组织，包括大贵族所在，仍以血缘组织为主，墓地的组织方式也与活人的社会组织方式一样。良渚反山墓地虽然当时与众不同，但不可能超越历史，更不可能提前超越商代就出现了无血缘界限的纯贵族的“贵族墓地”。

最近，有专家一再强调“良渚古城”内 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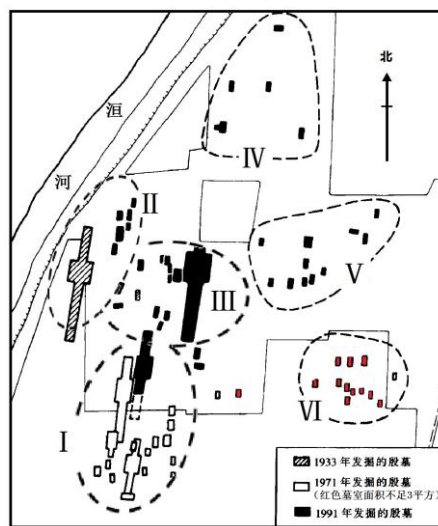


图 2：殷墟后岗墓地墓葬分布示意图

（引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图中虚线圈与编号系本文作者所加）

¹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 2002 年版。

¹⁷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¹⁸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 页。

¹⁹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 年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 年第 3 期。

²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 年版，第 132 页。

发掘的良渚文化中期姜家山墓地就属于“贵族墓地”²¹。

姜家山墓地位于反山墓地南侧，也是依托自然岗地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已发现 14 座墓葬，大致呈三排分布，男性墓头向均朝南，女性墓除 M7 外均头向朝北，男女性墓葬交错分布。其中，既有高等级墓葬，也有随葬品较少的普通居民甚至小孩的墓葬²²。

显然，姜家山也是一处家族墓地，而非纯正的“贵族墓地”。之所以会有“人工高台”就因为这是一个高等级的家族，其中有人是“贵族”，有人是平民。因此，不能在史前墓地里见到有贵族的高台墓地就以为整个墓地的性质就属于单纯的“贵族墓地”。

位于安溪镇下溪湾村的瑶山祭坛墓地也如此，所有墓都有玉器随葬，很像是一个单纯的“贵族墓地”²³。但是，那些墓葬的等级高低也差异明显，尤其是 M5，不仅出土玉器数量最少，只有 22 件，而且琮璧钺全无，显示墓主很可能只是一个一般的小贵族，并说明那里就像反山、姜家山一样也存在一个当地高等级的家族墓地，夫荣妻贵，父荣子贵。但是，它们绝不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地缘化的单纯的“贵族墓地”。

泡沫五：“良渚古城”内根本没有独立与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

专家认为，在“良渚古城”范围内还存在“独立”与“专门”的“手工作坊区”²⁴，特别是内城钟家港河道西侧区域的南段和北段，由于紧邻两岸台地，所以河道堆积中存在大量的遗物。其中，钟家港南段西岸的李家山台地边缘就揭露出保存良好的木构护岸遗迹与木器坯件等漆木器；在钟家港南段东岸的钟家村台地边缘也出土了较多黑石英石片、玉料、玉钻芯、石钻芯等遗物，从而显示李家山和钟家村台地上可能分别存在漆木器和玉石器作坊。由于这是城内首次发现的手工业作坊区，故推测古城城内除了宫殿区、王陵和贵族墓地等核心区以外的台地主要都应该是手工业作坊区²⁵。

然而，这种专门独立的不属于任何特定血缘组织的手工业作坊区至少要到地缘社会的春秋战国才出现，因为从史前晚期一直到商代殷墟和西周，所有的农业与手工业都属于一定的血缘组织，所有的农业与手工业社会分工都只发生在大型的血缘组织内部，并有二个重要特点²⁶。一是所有的作坊都要服从上级的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二是所有的作坊都属于次一级的血缘组织，都是具体氏族和部落在各尽所能基础上赖以生存赖以工商“食官，官廩之”的基本产业（《周礼》）。

史前晚期，考古发现，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内城外共有 3 个地点发现了可能是冶铜的遗迹和遗物。其中，邓家湾，位于小城内的西北²⁷；肖家屋脊²⁸与罗家柏岭²⁹则位于大城



图 3：殷墟孝民屯发掘成果平面图（1）

与 A 区半地穴式房址分布平面照片（2）

（引自：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孝民屯商代房址 2003—2004 年发掘简报》）

²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 年浙江重要考古发现选介》，中国考古网，2016 年 12 月 12 日。

²² 宋晗语：《从墓葬等级看良渚社会结构》，《余杭晨报》2019 年 6 月 24 日。：

²³ 浙江省考古所：《瑶山》，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

²⁴ 刘斌等：《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2019 年 7 月 8 日。

²⁵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城内考古发掘及城外勘探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 年 12 月 16 日，第 8 版。

²⁶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40—310 页。

²⁷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邓家湾》，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3 页。

外的东南。由于铜是当时的贵金属，铜的制品也只有贵族才能享用；又由于冶铜也是当时手工业技术含量最高的顶级产业；所以它的生产活动绝不是个别聚落的随意行为，而是都服从小城内核心聚落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坊也是所在聚落所在血缘氏族赖以生存的产业和资本。

商代晚期的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也一样，虽然远离小屯宫殿宗庙区约 2 公里，但它所出土的商代顶级陶范却毋庸置疑的表明那里是一处“王室直接控制”的手工作坊（图 3，1）。但是，作坊周围的半地穴式住房，仅 A 区就有 27 组近百间（图 3，2），从而说明该作坊就应该一直是当地整个血缘部落各氏族所共有的产业。

实际上，商代晚期之所以会存在“百工”与“世工世族”现象就充分表明，当时所有的作坊都属于具体的血缘组织氏族或部落，并没有在城内形成脱离了血缘组织的专门单纯独立的“手工业作坊区”。

此外，《左传·定公四年》所言西周分封鲁国的“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封卫国的“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铸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就证明商代手工职业与基层血缘组织之间不仅存在明显“世工世族”的长期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还转变成了有关血缘组织的社会特征，也同步说明当时并没有出现不属于任何基层血缘组织的单纯的“手工业作坊区”。

历史表明，真正独立的手工作坊区是社会地缘化的产物，是生产资料使用权完全个人所有的产物，是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市”的出现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证明。

泡沫六：“良渚古城”内根本没有“城址区”

“城址区”是一个“良渚古城”考古与研究所提出的独有的全新的考古学概念。

就字面的含义而言，它介于史前血缘组织的“城址”与现代地缘社会城市的“市区”之间。一般而言，现代城市的市区即城区多指城市中人口密集，工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是城市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区域，即市中心和周围连片的城市区域，如北京的东城区、西城区；而新概念想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良渚古城”也与现代的城市一样，既有市中心，又有周边的城区（图 4，1），甚至还有“郊区”（图 4，2）³⁰；其中，城区就包括宫城、内城、外城三部分；而周边的城区或郊区则根据不同的理解来随意划分（图 4，4），这样“其规模不亚于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的都邑性遗址”。

然而，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地拔高“良渚古城”意义的认识。

第一，史前晚期一直到商周时期，城址都属于一定的血缘组织，城内城外的聚落都是同一个大型聚落组织的不同成员，城外也根本没有独立于血缘组织的地缘化的“城址区”的部分和地域，更没有突破了血缘界限完全地缘化的“郊区”，河南安阳殷墟即如此（图 5）。

第二，要正确理解和认识史前城址的属性和特点，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正确理解和认识城址所在聚落组织与组织形态的性质与特点。舍此，完全是本末倒置。关于“良渚古城遗址”特点与性质的识别与理解即如此，不仅丝毫没有与史前聚落组织相联系，而且从一开始就与晚期地缘社会的城址挂钩，从而彻底地误解了历史的真相。

第三，截至春秋战国为止，考古在各诸侯国都城的外围也没有发现所谓的“城址区”。因为当时“筑城以卫君，筑造廓以守民”（《吴越春秋》），民都集中在“廓”内，“城址区”与“市”都在城内，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在城外设置“城址区”了。

²⁸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6 页。

²⁹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 年第 2 期。

³⁰ 刘斌等：《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2019 年 7 月 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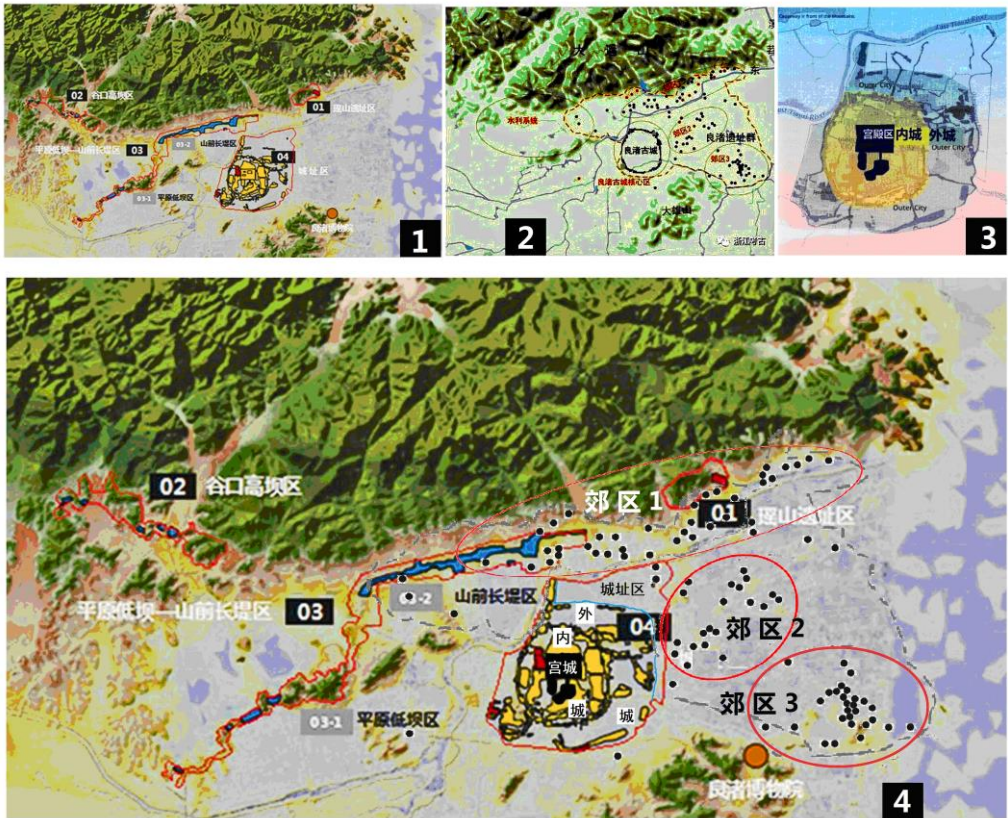


图 4: 史前“良渚古城遗址”地缘社会的结构与布局示意图

1、良渚古城遗址平面图；2、良渚古城郊区平面图；3、良渚古城城址区平面图；4、本文作者集成图

(1 引自：刘斌等《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2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 年浙江重要考古发现选介》；

3 引自：杭州网《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被世界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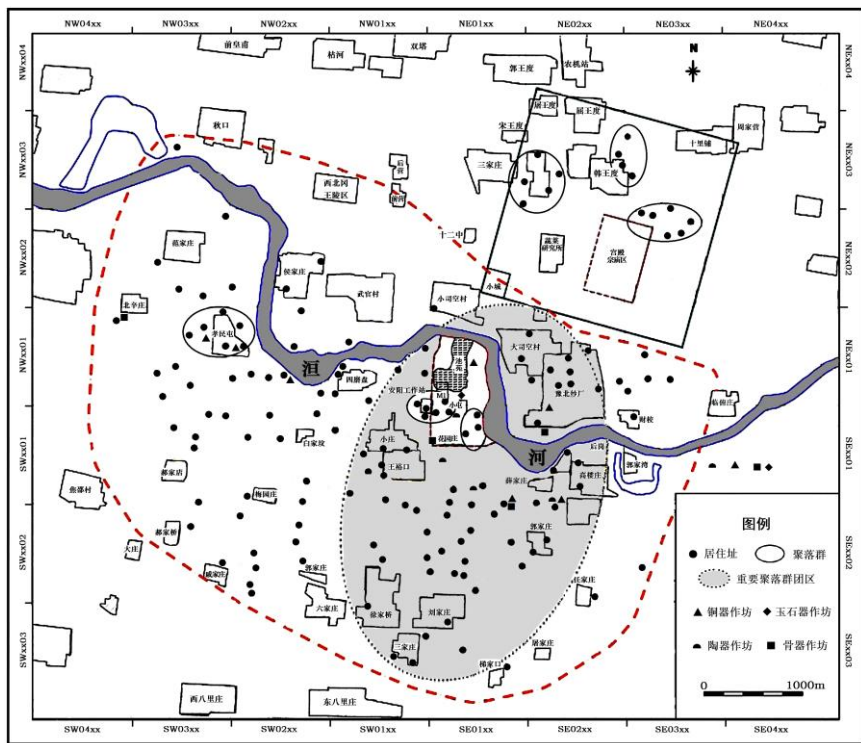


图 5: 殷墟的聚落遗址分布位置与政治组织结构示意图

(引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图中实线圈、虚线圈均为本文作者所加)

第四，根据图4的显示，良渚专家们的“城址区”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区域，并有三大特点。一是，地域广阔，外城北部至东苕溪之间大于内城一半的面积皆属“城址区”；二是，人口聚落稀少，整个区域只有二个聚落；三是，这二个聚落还明显偏安一隅，只位于“城址区”的东北角。显然，这种地广人稀的区域和所要表达的“城址区”的内涵是矛盾的，也名不符实的；而且将这样的区域赋予“城址区”的含义也显示研究者对问题认识的轻率。

泡沫七、八：“良渚古城”内根本没有“中国最早的重重城市格局”

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其宫殿区、内城、外郭的格局类似后世都城中宫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结构体系，是中国最早的重重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³¹。

然而，这种比较结论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它们相互之间仅只是形似而神不似，根本没有可比性。

（一）城址“三重结构体系”的历史意义完全不同

史前是血缘社会，夏商周也只是血缘地缘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因而当时所有的城都是血缘组织的城，城内城外聚落的分布与城址规模结构也完全与血缘组织各成员的等级地位相匹配，湖北天门石家河、河南安阳殷墟就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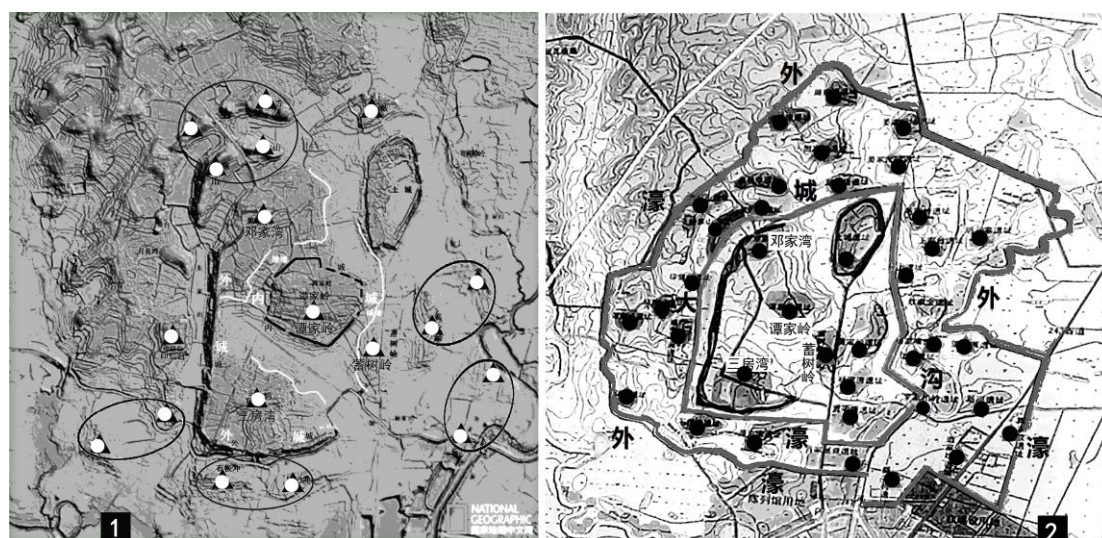


图6：湖北天门石家河屈家岭文化（1）、石家河文化（2）时期城址与聚落分布图

（1引自：国家地理中文网；2引自：本文作者2018年12月摄于石家河发掘工地宣传栏）

据考古发掘与调查，距今5—4.5千年屈家岭文化期间，整个天门石家河聚落群团就完成了城址的全面建设。其中，聚落群团的核心聚落，类似“良渚古城”莫角山那样的“宫城”和“宫城区”，类似反山那样最高等级的“王陵”，以及类似莫角山上那样的平民住宅与墓葬都位于26万平方米的内城中的谭家岭遗址上³²。此外，在内城外还有120万平方米的大城，里面住的全是核心聚落群的其它成员，即邓家湾、三房湾、蓄树岭等聚落。在大城外，聚落群团的其它非核心聚落群成员就超近距离的聚集在城的周边，最近的不超过2百米，至少5个聚落群14个聚落（图6，1）。石家河文化时期，虽然当地的聚落组织整体由屈家岭时期的聚落群团升级成为了聚落集团，但内城、外城里面的聚落组织状况没有大的变化，变化最大的一是城外的聚落数量由14个翻了一番还多，变成了至少30个；二是所有的聚落全部位于外环壕之中（图6，2）。

商代，虽然国体已经地缘化了，但政体依然还是血缘化的，基层社会组织依然还是血缘

³¹ 刘斌等：《良渚古城在中国城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杭州日报》2019年4月26日第23版。

³²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谭家岭》，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江汉考古编辑部2016年版，第32页。

组织，安阳殷墟即如此，就是一个超大型的聚落集团（图 5）³³。其中，小屯宫殿宗庙区就是核心聚落群团的驻地。1991 年花园庄一带再次发掘，H3，出土甲骨 1583 片，清一色“非王卜辞”³⁴，由此证明当地就住着一个与王同属一个聚落群团但非王一族的聚落群或部落。

事实表明，从史前一直到夏商周，中国的城址与都城周边只有同一个大型血缘组织的成员驻地，而从未出现过完全地缘化的宫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结构体系。

根据已有的资料，中国出现宫城、皇城、外郭三重结构都城的时代最早滥觞于魏晋时期³⁵，其意义完全是地缘化的是强化中央集权制的重要举措，与任何血缘组织和民族都没有直接关系。

正因此，因为史前血缘社会的城址和结构在外观上与地缘社会的城址和结构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就认为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意义，这是疏于深入研究而简单类比的结果，是重形式逻辑而轻历史逻辑的结果。

（二）城址的“三重结构体系”完全与“市”无关

根据专家的论述，只要具有了“宫城、皇城、外郭三重结构”的城址就具有了“三重城市”的含义，这完全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中国的“市”在东周以前与城没有任何联系，也与魏晋以后“宫城、皇城、外郭三重结构”的城没有任何联系。史前至商周，所有的城里都没有市；而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城里还没有出现“宫城、皇城、外郭三重结构”，但“市”已赫然存在³⁶。魏晋以后，“宫城、皇城、外郭三重结构”的城的出现也是因为社会政治的需要而与“市”的发展和需求无缘。

事实上，“良渚古城”即使具有“类似后世都城中宫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结构体系”，也根本不可能超越历史成为“城市”。

中国的考古表明，城市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一种地缘社会的人类共同体与组织单位。它的主要形成途径，一方面是国体政体全地缘化国家的出现，否则城址就会像商晚期的河南殷墟、西周时期的山东临淄一样，被一定的血缘组织和统治民族的人所占领；另一方面就是在生产资料使用权完全私有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的兴起，因为没有这种私有产权就没有商品经济，就没有城乡的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城”里就不需要“市”。实际上，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地缘社会才拥有的历史现象。一般而言，社会地缘一体化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基础，任何地方的手工业和农业都不可能在独自为政的血缘社会和血缘组织之间实现所谓的“社会分工”，即使有剩余产品也只能“交换”而无法“流通”。此外，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还必须个人完全所有。否则，产品都是集体的、国家的，也不可能变成可随意销售与自由竞争的商品。

显然，“良渚古城”即使具有“宫城、皇城、外郭三重结构”也根本不可能先于东周就成为历史上最早与社会分工与商品经济有关的“城市”。

泡沫九：“良渚古城”不能证明中国只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专家认为：国际学术界由于对中文文献不了解，对中国考古学的进展也停留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中华文明的起始时间常常定在晚商殷墟；而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与深入研究，将有力地改变这一传统观念，并证实良渚文化已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³⁷。

然而，“良渚古城”考古工作者的认识也同样停留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根本不知中华文明史已超过了 8 千年，“良渚古城”本身就是社会文明化的结果。

³³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401—404 页。

³⁴ 曹定云：《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殷代早期的珍贵史料》，《中国教育报》2004 年 3 月 5 日。

³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³⁶ 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 年第 3 期。

³⁷ 刘斌等：《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2019 年 7 月 8 日。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将“文明”与“国家”这二个概念捆绑在一起，并认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³⁸。

但是，中国的考古表明：文明是人类社会高品质的发展状态和发展阶段，也是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本身的解放不断的进步与变革。不因国家而起，也不因国家而亡。国家只是人类地缘社会的一种组织方式与组织形式。以前没有，以后也会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现和世界“大同”而消亡。

中国的考古还表明，距今约 8 千年前后，中国的文明就已经起源了。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变化就是人与人之间，聚落与聚落之间，都出现了等级地位的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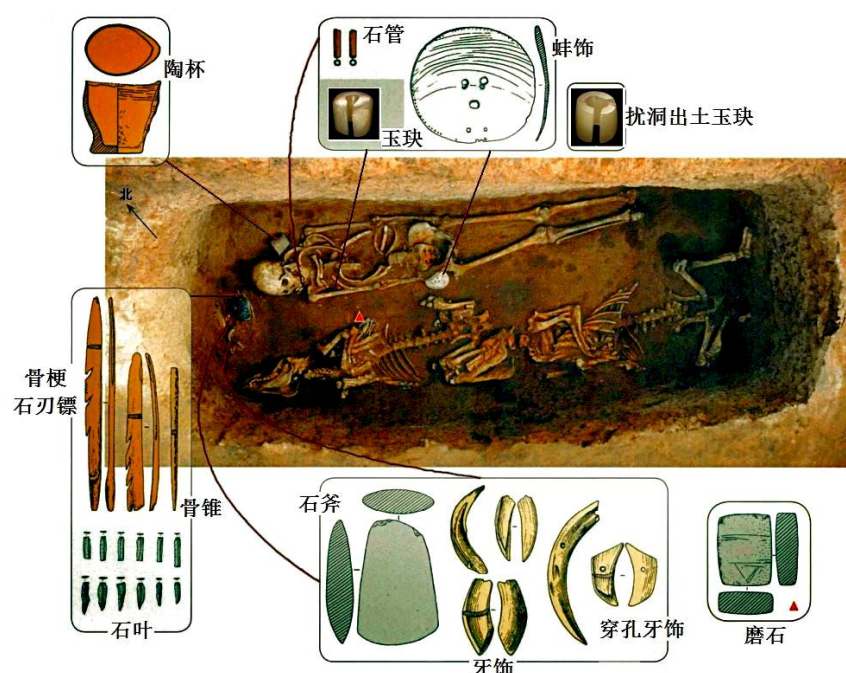


图 7：兴隆洼遗址 M118 发掘照及随葬品器物图

（引自：杨虎等《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

人与人之间等级地位分化的最早标志就是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图 7）。对此，1991 年 8 月，在《文明发端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一文中，苏秉琦先生就说到：“查海玉器已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同年 12 月，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的论述中，他又进一步指出：“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苏先生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最早且充分地肯定了兴隆洼文化玉器作为文明起源标志的社会和历史意义。

关于聚落之间等级地位分化的标志主要见于浙江嵊州小黄山³⁹、河南新郑唐户（图 8，1）⁴⁰等多聚落遗址的发现。因为在这些遗址中人类血缘社会以往各成员独立平等的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主从关系、出现了核心聚落与从属聚落。其中，核心聚落就住在环壕之内，其它从属聚落就围绕在壕沟以外（图 8，1）。

大约距今 5 千年前后，文明的阳光已洒满了人间，并给当时的人类社会带来了 8 大变化。

变化 1：自然的广谱经济转变为人为的生产性农业经济。

变化 2：生产方式由集体劳动转变为早期个体劳动。

变化 3：一夫一妻制婚姻与家庭开始普及。

³⁸ 王巍：《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关概念的理解》，《史学月刊》2008 年第 1 期。

³⁹ 王海明：《专家论证嵊州小黄山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 年 1 月 11 日；张恒等《“小黄山”万年古文明的见证》，嵊州新闻网 2011 年 4 月 25 日。

⁴⁰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 年第 5 期。

变化 4：个体家庭成为了血缘社会独立的最小组织与经济单位。

变化 5：母系社会变成了父系社会。

变化 6：财富私有制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贵族。

变化 7：个人开始由集体中的一员变成了集体中独立的个人。

变化 8：社会由分散开始走向整合与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考古还证明国家是社会文明化的结果，是社会由分散走向整合与统一的结果，是社会由血缘过渡到地缘的结果。

距今 8—5 千年，以无长年积水的壕沟、有长年积水的濠沟和早期单聚落古城为代表，标志新兴的各成员之间主从关系明确一体化的聚落群即部落的崛起，浙江嵊州小黄山、河南新郑唐户等多聚落遗址（图 8，1）、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图 8，2）⁴¹就是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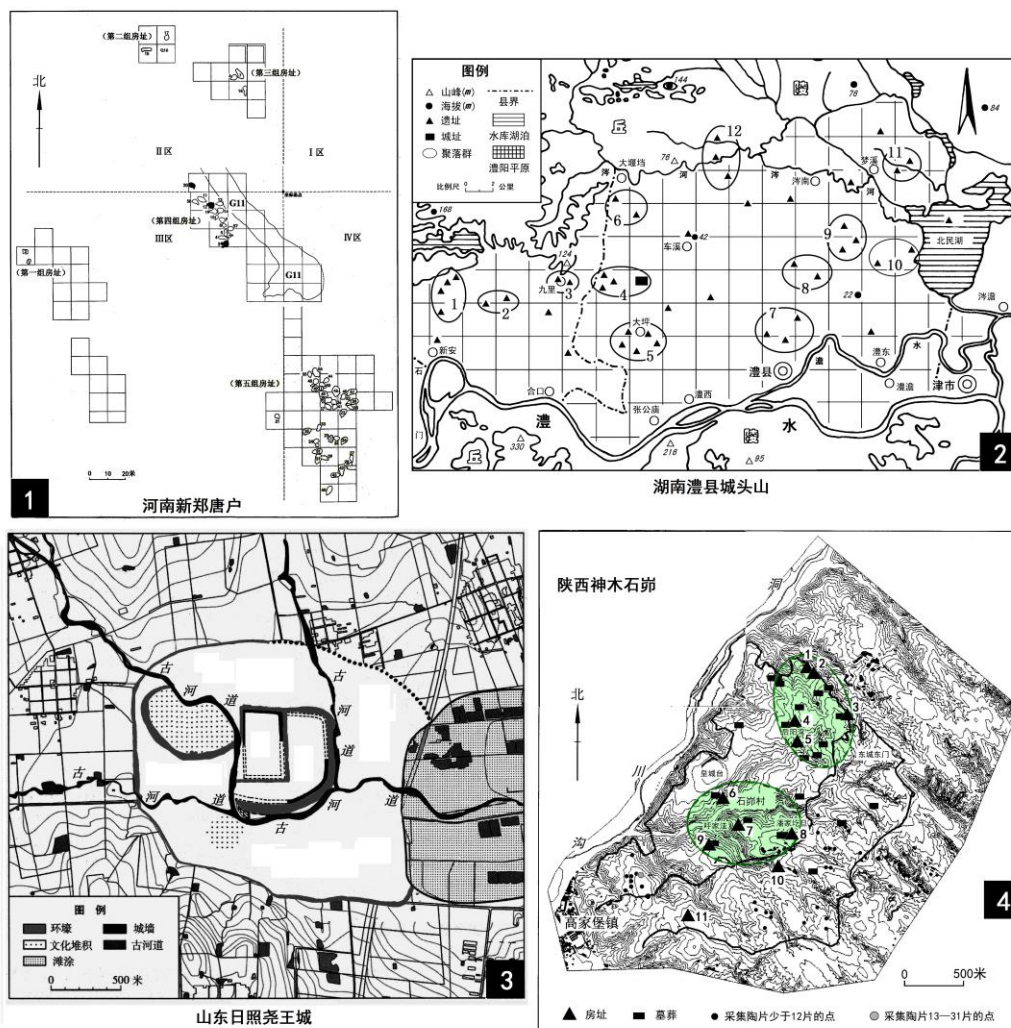


图 8：河南唐户、湖南城头山、山东尧王城、陕西石峁遗址平面与聚落群聚形态示意图

（1 引自：张松林《郑州市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思考》；2 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

3 引自：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4 引自：陕西考古研究院等《发现石峁古城》）

距今 5—4.5 千年，以聚落群即核心部落多聚落驻守的中期古城为代表，标志新兴的一体化的聚落群团即永久性的部落联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图 6，1）、山东日照尧王城⁴²（图 8，3）就是代表。

距今 4.5—4 千年，以聚落群团即核心部落联盟多聚落驻守的晚期古城为代表，标志新

⁴¹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版。

⁴² 梁中合：《日照尧王城遗址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 30 期，第 12—21 页。

兴的一体化的聚落集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陕西神木石峁西城区⁴³（图 8，4）就是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就出现在这一历史时段，但不是“良渚古城址”。

由于“良渚古城”内外城范围内实际近距离聚集的就是一个不少于 8 个聚落群 17 个聚落遗址的聚落群团（图 9）⁴⁴；又由于良渚遗址群的范围内实际近距离聚集的至少就是一个以古城为核心的不少于 4 个聚落群团的大型聚落集团或其它性质的组织（图 4，4）⁴⁵。因此，“良渚古城”本身也是社会文明化的结果，而不是文明起源的开端与标志，更不能为了抬高良渚的历史意义而大幅缩短中国文明起源的最早时间，并证明中国只有五千年文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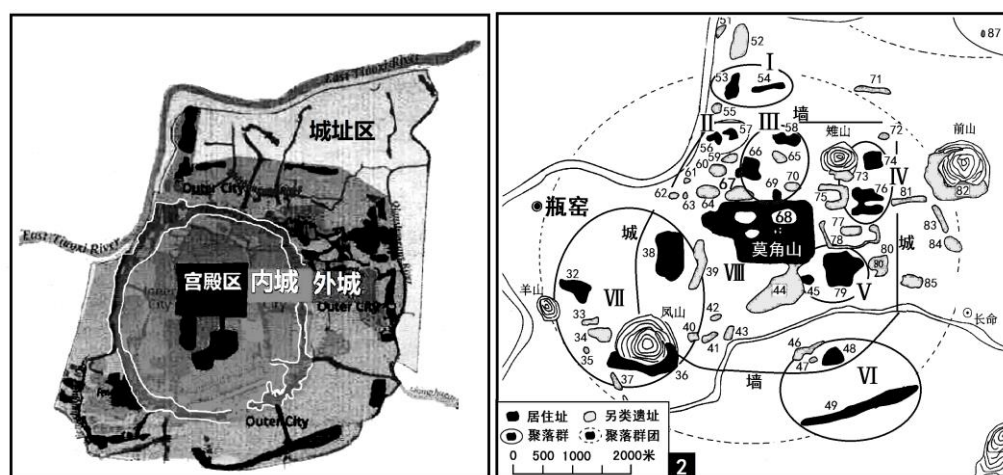


图 9：瓶窑古城范围内聚落遗址分布示意图

1、专家认定的古城范围；2、《良渚遗址群》显示的遗址分布图

（1 引自：杭州网《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被世界认可！》；

2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

泡沫十：“良渚古城”根本不是“早期国家”

专家认为：“良渚古城”是一个“早期国家”，核心区由宫殿区、内城、外郭城构成，占地面积约 8 平方公里；而且同时在城外还发现了规模巨大的水利系统和面积广阔的“郊区”，从而使它们与古城核心区共同构成了占地面积达 100 平方公里的早期国野体系⁴⁶。至于这个“古国”的范围有多大，无形的权力边界在什么地方，却未明确指出。此外，关于早期国家有什么特点？早期国家的定义和认定标准又是什么？专家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实际上，国家是人类地缘社会的一种组织方式与形态，国家的基础与特点就是暴力。历史的发展表明，要最终破除人类社会组织初始的血缘和民族纽带实现地缘一体化，没有暴力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国家要在国民之间建立政治上的压迫与经济上的剥削的统治制度，没有暴力也是不可想象的。早期国家，也就是历史上时代最早的国家，中国的考古表明由于它发端于血缘社会，所以它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血缘组织，是一个族体统治、压迫和剥削另一个族体。因此，要认定一个早期国家仅依靠专家自认为的“宫城”、“王陵”、“城市”、规模巨大的水利系统、超乎想象的社会动员能力，都只能说明它们是在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而不能说明它们已经具有了统治、压迫和剥削他人的特征。显然，一定要找到它的统治、压迫和剥削对象，才能实证“良渚古城”是国家。

但是，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良渚古城”就从未发现过被统治、压迫和剥削的对象。

⁴³ 陕西考古研究院等：《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 2016 年版。

⁴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版；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355—358 页。

⁴⁵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354—374 页。

⁴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城内考古发掘及城外勘探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 年 12 月 16 日 8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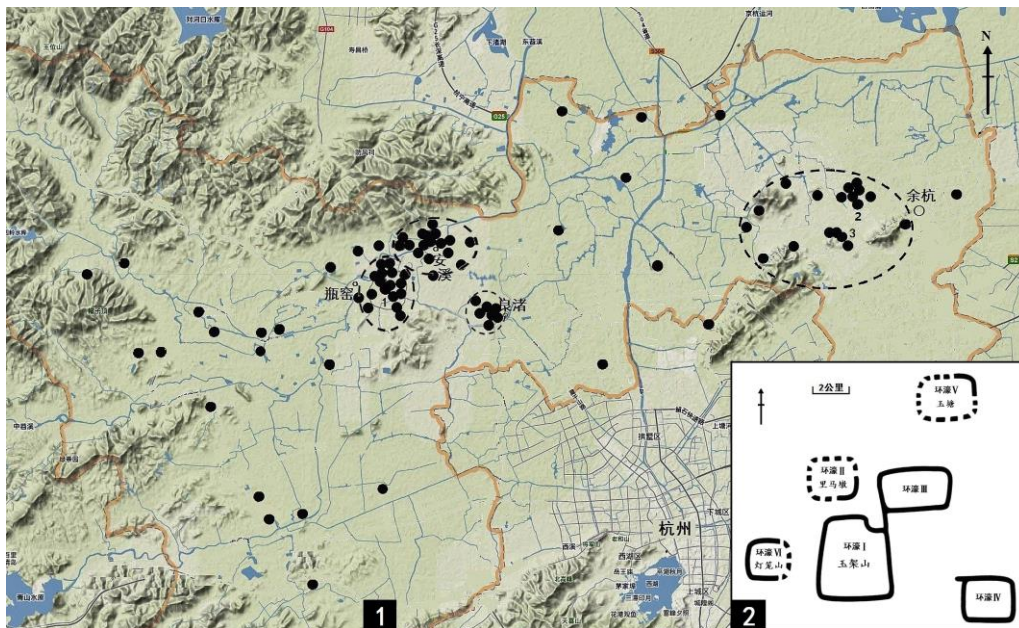


图 10：浙江余杭良渚三镇与临平镇良渚文化聚落遗址分布示意图

1、莫角山，2、玉架山，3、横山

(1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余杭文物志》编纂委员会《余杭文物志》；

2 引自：赵晔《浙江余杭临平遗址群的聚落考察》)

2000 年，余杭市有关部门曾编辑出版了一本《余杭文物志》⁴⁷，书中对整个市区范围内良渚文化遗址的分布进行了重点描述，从中可以明显看到，在良渚镇以南一直到杭州是一大片因地势低洼而形成的数十公里人迹罕至的区域，只有以东的临平才有一个相距约 15 公里的区域有一个聚落组织（图 10，1）。

然而，这个组织却有二个特别令人关注的现象。

其一，临平聚落群团有近 20 处聚落遗址相聚在一起。其中，还有一处以玉架山遗址为首的环境聚落群，一共有六个遗址，多数相距都不足二公里（图 10，2）⁴⁸。

其二，在该群团的横山遗址还发现二座玉器墓，特别是未经扰乱的 M2 令人感觉非同一般⁴⁹。该墓共出土玉琮 4 件、玉璧 2 件、玉钺 1 件、石钺 132 件，包括其它器物共 284 件，被专家们认为是“非一般部落成员”，而是“集神权、财权和军权于一身”的显贵。可是，与良渚的同类墓相比，该墓却特点明显不同。

第一，共出玉琮 4 件，象征地位高过良渚遗址群瑶山的所有墓，因为瑶山没有一墓超过 3 件。

第二，没有人工专门营建的祭坛；而且玉器从材质、工整度到细刻纹饰都相对粗糙，都不如良渚遗址群。

第三，随葬了 132 件石钺，“这是迄今所见良渚墓葬中出土石钺最多的一座，比瓶窑汇观山遗址 M4 出土的还要多 84 件”。但该墓的石钺“个体普遍较小，制作多粗糙甚至粗陋”。

第四，墓葬的年代为良渚文化中期偏晚，并明显晚于反山、瑶山等多数高等级的大墓。其中，玉琮就有 3 件是多节型的，比良渚三镇的汇观山 M4 还多 1 件。

显然，上述现象说明临平聚落群团与良渚三镇根本不属于同一个“良渚古国”。

一方面双方礼制与礼器的结构大不相同，另一方面玉器、石钺的制作质量也大不相同。假如都是一家，假如都是一个统一的古国，官员都是古国统一任命的，礼器也是古国统一派发的，那还会存在上述现象吗？难道在古国狭小的范围内，各聚落组织还可以自由制作玉礼器，想随葬什么就随葬什么，想随葬多少就随葬多少？

另一方面，横山 M2 的年代明显晚于反山、瑶山等多数大贵族墓，而与汇观山 M4 相当，

⁴⁷ 编纂委员会：《余杭文物志》，中华书局 2000 年。

⁴⁸ 赵晔：《浙江余杭临平遗址群的聚落考察》，《东南文化》2012 年 3 期。

⁴⁹ 浙江省余杭县文管会：《浙江余杭横山良渚文化墓葬清理简报》，《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 60 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 年，第 69 页。

这说明临平聚落群繁荣发达的时间比良渚三镇延续的时间要长要晚，也说明它所在聚落组织的发展并没有受到过外力的干预和阻滞。

正因此，瓶窑古城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古国的都城。一方面，良渚三镇的聚落组织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对外武力征服以建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迹象；另一方面，良渚“遗址群”与临平“遗址群”不仅都是独立的聚落组织，而且各自还有不同的发展方式与发展特点。

值得注意的，由于“良渚古城”根本不是早期国家，所以所谓“占地面积达 100 平方公里的早期国野体系”也就不吹自倒了。实际上，即使“良渚古城”是早期国家，当地也不存在“国野体系”。因为最早的国野制只见于西周，其中“国”就是统治民族周人的住地和区域，“野”就是被统治民族族人的驻地和区域。为此，难道专家们是想把“城址区”以外的包括“郊区”的所有人，也包括瑶山墓地的贵族，都视为“野人”吗？显然，这里的逻辑是混乱的讲不通的。

结束语

事实表明，“良渚古城”申报世界遗产的研究与认识的学术问题绝不止上述 10 个泡沫；但这并不只是整个中国考古学的个案，而是当今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与现象的反映。

概而言之，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急于求成。

“良渚古城”研究不是去求证考古发现原始的本来意义，而是大量与一些表面上形似的晚期历史现象进行比对，就是这方面问题的表现与反映，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有利于一些新发现重要性的突出和历史意义的快速拔高，有利于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各种激励。

第二，传统的源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源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启发先复原历史再研究历史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被抛弃了。

“良渚古城”从平时的考古发掘到本次世界遗产的申报之所以很少提及中国血缘社会的特点、演变与发展，也很少见氏族、部落、家族、家庭、私有制等字眼。这表明人们对血缘社会原貌的探索和研究已经不屑一顾了，已经淡化了，而基于血缘组织与组织形态来研究当时社会和城址发展与变化的思路也被完全抛弃了。

第三，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横行霸道积重难返。

尽管“良渚古城”在世遗申报的字面上大量使用了还是中国历史方面的概念和用语，但底下掩盖的却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引进的“区域聚落形态”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专家们之所以一味将史前的发现与晚期历史时期的相似现象挂钩，其中作祟的就是“区域聚落形态”的理论与方法，因为“区域聚落形态”理论与方法的本质就是人为地用现代地缘社会学历史学的概念架空和替代了关于血缘社会本来面目的复原与研究。由于急于求成，所以这种理论大受中国考古学界的欢迎。这次“良渚古城”申遗之所以大获成功，一方面确实是考古发现独特精彩，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的学术与世界“接轨”的回报。之所以多次免费来中国考察的外国专家，著名的科林·伦佛儒先后二次，第四届文化遗产世界大会主席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魁北克大学教授露茜·莫里赛特先后三次，在见到良渚文化的城址和遗迹遗物以后，没有一个人谈到史前原始血缘社会的复原问题，也没有一个人谈到城址内外聚落与聚落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这说明当代中外的“接轨”已具有了很高很深的融合层次。

显然，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良渚古城”申遗成功，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但愿“良渚古城遗址”的成功申报能使中国考古学警醒，盲目跟着别人走很危险，应该重走先复原历史再研究历史的正道。